

# 始终做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先行者

董云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上海作为我们党的诞生地，作为一个不断见证我们党创造奇迹的光荣城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始终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先行者。

100年前，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历史地成为我们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中华民族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奋斗进程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重要见证，饱受苦难和屈辱，始终处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祥地和最大的经济中心，作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对外窗口和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历史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大本营，历史地成为先进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集聚地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镇，由此孕育了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诞生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党成立后，上海长时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党中央机关常驻扎上海长达12年，我们党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建党均在上海完成，党的一大、二大和四大在上海召开，这里诞生了我们党历史上许多个第一。即使中国革命主力由城市转入农村后，上海仍然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界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可以说，上海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起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铸就了从石库门到天安

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的千秋伟业。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作为“共和国长子”，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上海实现了由“冒险家乐园”到人民城市的质变，获得了新生。在党的领导下，上海自觉担当起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的国家责任，为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上海作为国家的重要工业基地和财政支柱，承担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重任，几乎占据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中国制造”的许多个第一。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财政收入约占全国1/8，为国家积累资金约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36%。1950年至1962年间，为支援全国建设，上海先后有679家工业企业外迁至20多个省区，涉及20多个行业。197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8，出口总额占全国超过1/4，财政收入占全国1/6，90%以上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可以说，上海这座新生的人民之城，以主人翁的姿态艰苦创业、发奋图强、无私奉献，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共和国改天换地、开基立业、自立自强提供了重大支撑。

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王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抓住浦东开发开放契机，以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勇立潮头，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诞生了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基本建成了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实现了经济实力、城市能级和人民生活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发展的伟大奇迹。浦东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国贡献了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大飞机等国家重大科技成果都凝聚了大量上海创造的智慧。可以说，上海这座历久弥新的创新之城，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鲜活的成功实践和骄人成就，生动诠释了党的初心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新时代新阶段，上海将勇当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努力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要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远扛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殷殷嘱托，也是新时代上海应有的使命担当。

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筑牢城市根脉，努力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深入发掘、大力宣传我们党在上海孕育、建立和领导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奋斗历程和伟大精神，把上海打造成为讲好建党故事、彰显建党初心、弘扬建党精神的红色高地，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党的根脉所在”、作为红色文化总源头的独特作用，为我们党建设好立根固本、铸魂塑魂的精神家园。坚持把建党精神融入上海城市精神，着力建设红色的人文之城，续写党的光荣与梦想。

## 政协委员学党史

# 让阅读成为政协委员鲜明的标记

王建国

自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倡导“开展读书活动，建设书香政协”以来，江苏省常熟市政协积极响应，开启“悦读虞城·书香政协”活动，建立“1+4+14”读书网格，即1个全市政协委员读书室、4个主题读书群、14个镇（街道）读书吧，开展线上读书、线下交流、阅读分享，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各界人士共识。

得益于委员读书活动深入开展，常熟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基础更加扎实、成效更加显著。在实践中，笔者对基层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形成了一些认识和体会。

基层政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最迫切、易做实、成效好。基

层政协委员工作在一线，更多的是带着问题学、解决疑惑学。学用结合得紧，知行融合得好，是显著特点。基层政协委员与所联系的界别群众有天然的、直接相连的关系，当好“领读人”的角色，承担阅读倡导、价值引领的责任，更容易被接受、更能得到认可，能够更好地以“书香政协”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把委员读书活动贯穿全过程、推进全覆盖、走向全社会。今年，常熟政协开展的“悦读虞城·书香政协”第二季活动，从完善读书机制、明确读书主题、规范读书活动、展现读书成果等方面作了探索，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初步设想。一是把读书活动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读书主题内容涵盖政协履

职的方方面面。二是从机制上保障委员全覆盖参与；强化读书会组织功能，制定读书会全年读书计划，开展线下交流不少于40次，参与委员数不少于全体委员的1/3；强化界别组学习功能，经常性开展议政性学习交流，委员参与率不少于80%；强化镇（街道）工委载体运用，每个镇（街道）工委每年开展2次委员与基层干部、群众共读活动。三是以委员读书助力全民阅读。联合市委宣传部，把委员读书活动纳入市委阅读大局，发挥委员读书主体作用，引领界别群众读书新风尚。

开展好委员读书活动要坚持政治性、自觉性、开放性、实践性。一是坚持政治性。政治性应体现在读书目标、读书内容、读书形

我们要坚持人民城市的性质定位和责任担当，努力建设好人民的幸福家园。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取向，切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谱写“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

我们要担当国家使命、当好时代标杆，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始终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国家战略，切实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不断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人民政协是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必须自觉践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这一政治初心，切实担当推动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这一时代使命。上海作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源地和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作为毛泽东曾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的县市级地方人民政协（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首创地，历来是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镇，理应在践行人民政协初心使命上走在前列、当好表率。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位，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中环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确保政协始终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我们要把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贯穿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着力重点，深入协商集中议政，强化监督助推落实，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福祉中，充分彰显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主席）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已可清晰预见。但在中国，国民党却从4月开始出现了对日作战的豫湘桂大溃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形成鲜明对比，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迅速高涨。国内有识之士已经清醒看到，要扭转败局，必须发扬民主，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全面抗战。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党考虑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向国民党提出战后和平建国

毛泽东的批示

由于9月初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将讨论下一届参政会的组成问题，8月17日，董必武在重庆致电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国民党与张澜、左舜生等中间力量商谈参政会加补参政员问题。当日，毛泽东在该电上写下了日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批示，指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答复”。毛泽东把向社会各界公开提出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要求在提出前征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秘书长左舜生的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给董必武、林伯渠电报提出，请他们考虑我党公开向国民党要求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召开真正民选的大会，并嘱咐此意见先行试探。毛泽东在这一电报上批准道：“应先召集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即使召集，也是假的”，并指出这一点将来要在党的七大上作决定。可见，毛泽东把成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目标提出来，并且希望将来以全党的意志固定下来，其具体步骤是先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

为向好向国民党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工作，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事项，正式把这一会议称为“国事会议”，作为组建联合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中央于9月4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党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做好了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组建联合政府的政策思想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项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决策。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中间党派对我们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加赞赏，但是不赞成用中共名义正式提出改组政府问题，认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主张中共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毛泽东便复电“即请作罢”，报告中“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请董必武、林伯渠酌量决定，但是在回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至此，在提出方式上我们党与中间力量做好了协调。

林伯渠的提议

9月15日，林伯渠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我们党正式在全国人民面前向国民党提出了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由于觉得林伯渠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毛泽东9月27起草了日后以林伯渠名义给王、张的复信，向国民党正式提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耳目。该信由林伯渠以林祖涵名义于10月交给张、王二人。

这样，我们党既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也直接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然而，国民党当局则是完全拒绝的态度。

周恩来的演讲

为宣传推动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10月10日在延安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著名演讲，详细阐述了“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

别特色至少确定2个协商主题，由区政协、镇街政协或界别小组、相关部门及社区联动组织开展；“X”指各基层平台负责联系、指导社区或界别群众，就其关注的焦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微协商”。同时，注重评估，通过党政点评、委员评议、群众评价和组织者评析，年末对各基层平台协商成效进行评估，优秀案例予以推广，使协商议事成果经得起检验。

（作者系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政协主席）

# 一项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

王新尚

——一九四四年联合政府、国事会议的提出及其对政协的影响

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实施步骤：

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时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组在国民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避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

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政治组织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立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对政协的影响

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关于抗战结束后的和平建国路线基本形成。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从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的提出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被毛泽东作为政治报告主题，这一主张无论是对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还是对于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都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一是为争取民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多次以我们党争取民主的要求“空空洞洞”“毫无边际”为由搪塞和拒绝，而第三方面大力倡导和推动的宪政运动则给国民党劫了旗帜。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出，解决了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目标和步骤，最终促成了1946年旧政协的召开，1949年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实现了这一主张。

二是成为当时团结民盟等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最大政治公约数。这一主张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民盟等第三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民主进步人士的政治利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呼声和愿望，成为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旗帜和方向，极大联合与团结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也成为后来“政协路线”的核心内容。

三是为1949年人民政协的召开奠定了政策基础。尽管形势和任务不同，然而从当时的政治设想可以看出，国事会议的组织形态完全不同于中间党派提出的各党派委员会和党派会议，也不同于旧政协，而1949年新政政协则与之极为接近。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秘书长）



百年同心 百年辉煌